

袁世凯与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

——亦谈清末袁世凯宪政改革态度

潘 崇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袁世凯在清末政局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预备立宪的决策及其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政府为谋求宪政改革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即出自袁世凯建言,经费筹措、随员选拔、炸弹案侦破,袁世凯无不参与其中,颇能助力其事。然而,袁世凯对戴鸿慈、端方考察团在吴樾炸弹案后关于立宪期限的调查不置可否,而对于考察团归抵上海后的立宪期限调查则积极支持,随后更是与考政大臣互为奥援,共同推动清廷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当设置责任内阁的主张失败尤其是被清廷开缺后,袁世凯对宪政改革之难有了新的体认,转而对宪政改革趋向保守。袁世凯之所以在宪政改革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在于其既有通过政治革新实现国家富强的目的,又有借宪政改革在政治漩涡中维护权势的意图。双重目的性真实地反映了清末时期袁世凯对待宪政改革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清末变革时期政府高层官员的政治活动实态以及官场生存法则。

关键词:清末;袁世凯;端方;宪政改革;五大臣出洋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3-0057-10

1906年9月3日,即清政府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的两天后,《华字汇报》刊文,对清政府采行责任内阁制充满信心,并且预断直隶总督袁世凯、考察政治大臣端方或同入政府,或一人政府、一充两江总督,将二人视为推行宪政改革的领军人物:

或云设置内阁之日,袁慰帅必自北洋转入于中央政府,充为管理内阁事务大臣或副大臣之要职,而端制军亦必应占内阁之一席也,何则?决定实行立宪,袁、端制军尤与有力,是以其责任又甚重大,自入中央政府立于责任之地位,非预备实行,未可谓尽其责任,两制军已负责任决定立宪,岂敢畏群言,将实行立宪之责任自诿他人哉?故曰两制军入中央政府就权要之重职无疑也。或云袁督必应入于政府,而端制军来督两江,盖实行立宪先灵通南北洋之消息,期其施为毫无分歧,最为紧要。^[1]

显见,袁世凯、端方在清末宪政改革之初具有很高的政声和人望。就袁世凯而言,自1901年出任直隶总督,力行新政颇著成效,新军编练更是在全国独占鳌头,再加上与奕劻等满族权贵深相结纳,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学界对清末时期袁世凯的宪政改革态度亦不乏关注,改革开放之

收稿日期:2013-12-10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端方年谱长编”(1233)

作者简介:潘 崇(1981-),男,河北曲阳人,讲师,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晚清政治史。

前,学界几乎毫无例外地将宪政改革时期袁世凯的种种表现贴上政治投机的标签,之后则开始逐渐肯定袁世凯对清末宪政改革的推动之功。然而,既往研究多从整个宪政改革进程着眼,诸多史实尤其是一些关键细节并不清楚。具体来讲,大多数研究关注到影响袁世凯宪政改革态度的外在因素,诸如宪政思潮发展、幕府人员以及立宪派建言等等,袁世凯似乎仅仅是受外力影响的被动者,同时对清末不同阶段袁世凯宪政态度之不同表现也缺乏细致的史实梳理,少了应有的时间维度^①。另有研究则不无武断地认定袁世凯是清末宪政改革的最大功臣,此种论调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研究和现实政治相混淆的产物,尤其值得商榷^②。

历史发展是复杂的,构成历史发展主体的历史人物常常具有双重性甚至多重性,如果我们只看到某一方面,就很难把握全貌。袁世凯久历官场并熟稔官场规则,他在清末时期的宪政改革态度表现得异常复杂,不同历史阶段甚至呈现前后矛盾不一的立场。日俄战争之后朝野宪政思潮日益浓厚,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政府做出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重大决策,标志着清政府艰难迈出宪政改革的第一步。本文即试图以五大臣出洋考察前后(自日俄战争至仿行宪政上谕颁布后的官制改革)为研究区间,以官方档案和报刊舆论排比、互证,探讨以往学界关注不够的袁世凯与五大臣出洋考察团之间的关系,以期细致展示这一时期袁世凯对待宪政改革的不同态度及其转变的心路历程。

一、建言出洋考察与清政府遣使决策之确立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至次年3月两国谋求议和。日俄交战缘于两国争夺在华权益且战场在中国东北,两国交战甫始立宪派即呼吁中国只有立宪才能自救,成为当时舆论的主流。但是,袁世凯日俄战争前后的建言仅限于中外交涉,并不涉及政体改革。

1903年12月27日,袁世凯指出,如果日俄开战,“不但中国立危且恐牵动全球”^{[2]2817}。1905年2月22日,袁世凯看到战争接近尾声,建言政府谋求日俄调停:“照会两战国使详述我民惨苦,嘱其电告本国劝请罢兵。”^{[3]10}实际上日俄战争前后吁请宪政改革的官员颇不乏见。1904年1月20日,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陈奏日俄一旦开战中国势处两难,“非毅然决然如日本明治初年,则虽日言变法亦必敷衍”^{[2]2840}。同年驻法公使孙宝琦建言“定为立宪政体之国”^{[4]83}。次年2月,驻日公使杨枢陈奏中日政体民情最为相近,改行宪政“宜仿效日本”^{[5]3287}。然而,日俄战争前后对宪政的鼓吹只限于极少数政府官员,袁世凯这一时期没有关于宪政的陈奏,他不属于陈奏宪政改革的第一个梯队。

日俄战争以日本获胜收场,国人普遍认为这一结局不能从国家大小、强弱去解释,根本上是立宪对专制的胜利,强烈呼吁中国应仿效日本推行宪政改革。日俄战争后清廷亦是痛定思痛,在政府内部对于是否改行宪政存在争议的情势下,于1905年7月16日颁布了派遣王公大臣随带人员出洋考察的谕旨。有研究指出,日俄战争期间,江浙立宪派运动商约大臣吕海寰、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魏光燾、湖北巡抚端方等人支持宪政,推动后者于1904年3月联衔陈奏以遣使出洋作为宪政改革的首个步骤^[6]。然而,吕海寰等人的陈奏与遣使谕旨相隔一年有余,仅可视为远因或者前奏。“国有大事,得重臣一言而震之”^[7],遣使出洋最终决断还须朝中重臣奏请,不少史料显示此一奏请出自袁世凯,参见表1。

翻阅目前已出版的各类袁世凯史料,笔者未发现袁世凯这一陈请,然我们认为袁世凯的确充当了这一角色。1905年日本议员平冈浩太郎来华探测中国内政,据《南方报》报道,平冈来华对袁世凯刺激颇深,推动袁作出遣使出洋考察之奏请:

^①相关研究如廖大伟:《袁世凯与预备立宪》,《史林》1990年第3期;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47页;张华腾:《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②民国时期日本人的袁世凯研究,多对袁世凯极尽奉承。如(日)内藤顺太郎:《袁世凯正传》,广益书局1914年版,第104页;(日)佐藤铁治郎著,孔祥吉等整理:《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表1 出使决策缘于袁世凯奏请的各种记载

| 各种记载 | 资料来源 |
|--|---|
| 直督袁制军世凯奏请简派亲贵分赴各国考察政治。 | 《中国立宪之起原》，《宪政初纲》，1906年12月，第1页。 |
| 大员出国游历本系直督袁官保所请。 | 《记钦派大员游历各国事》，《时报》1905年7月26日，第6页。 |
| 袁督复请派人考求各国宪法。 | 汉史氏：《清代兴亡史》，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70页。 |
| 五大臣出洋、丙午大更官制，皆（袁世凯）一人之谋。 | 胡思敬：《审国病书》，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445），文海出版社影印版，第1270页。 |
| 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以新外人耳目……由张之洞、袁世凯合折奏请或赞同办理。 | 刘禹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09页。 |
| 两宫问袁抑制革命风潮之策，袁乃陈各国宪政之善……故其时有五大臣考察列邦宪政之命。 | 《一个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第99页。 |

项城于平冈等去后语人云：日本之于波罗的海舰队不数十分钟而尽歼之，其强如此，中国与之邻，若不自振，其可得安乎？因有请简大臣出洋考求政治之奏。此折实拜发于五月二十六日，其大旨系请派大臣四人分往英法德俄美日六国，以一人游历两国。^[8]无独有偶，当时上海著名的立宪舆论《时报》亦报道：

出洋考查之举系五月二十六日北洋所奏请。原奏系分六国，每国各派二大臣，以一大臣就各国政治之专长详细考查，以一大臣副之，作为游历员。^[9]

确如舆论报道，袁世凯对平冈来华极为不满，其致电张之洞，陈述了进一步推进新政改革以及派员出国考察的重要性：

庚子以来外人咸盼我变法自强，朝廷亦屡诏行新政，而起视京外，实效寥寥，外人因益疑我轻我。现筹办法宜对症下药，亟需雷厉风行，革弊兴利，以实心行实效，举庚子后各项新政谕旨逐一考询内外工匠，已否实力奉行，有无明效。并飭王公大臣分班出洋游历，又遣专员分赴各国考察各项专门政治，以资采访而减阻力，使外人咸晓然知我发愤修政，非从前粉饰敷衍可比，庶有以阴服其心而杜其藉口。^{[10]9341}

当然，平冈来华只是袁世凯奏请遣使出洋的动因之一，根本原因则是国内宪政思潮的发展。早在1904年，东南立宪派领袖张謇即开始动员袁支持宪政，当时袁答复“须缓以竣时”^{[11]56}。次年张謇再次敦促袁带头奏请立宪，强调袁世凯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12]90}，可见张謇看重的是袁世凯在督抚中的号召力。此时袁接纳了张的建言，答以“愿为前驱”^{[13]372}。

从日俄战争期间不言宪政，到战后奏请遣使出洋考察政治而并非考察“宪政”，袁世凯宪政改革态度有一个明显转变过程。这一时期，尽管袁世凯对宪政的了解和认识有限，但他在日俄战争前后朝野立宪诉求日渐浓厚的社会情势下没有沉寂，更没有反对宪政，而是经过权衡作出此前已有人提到的遣使出洋考察的建言，这恰是袁有别其他官僚之处，尽管袁世凯对待宪政的策略为“可有立宪之实，不可有立宪之名”^{[14]837}，并未明言宪政，然这一策略恰恰迎合了慈禧的心思，据报道：“西太后语曰：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俟调查结束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15]16}遣使谕旨亦以“考求一切政治”为名，并未明言考察宪政。政治学上看，这种决策模式属于“渐进政策决策模式”，特点是“考虑到条件的复杂性和信息的不完整性，认为可以在确定清晰的目标特别是具体目标之前，先制定出一个大致的方案”^{[16]440}。但是，当时国内立宪氛围浓厚，考察政治无异于考察宪政，是以遣使谕旨颁布后，朝野“金谓将举行宪政”^{[17]113}，就政府官员而言，也仅限于心知肚明而已，并未就宪政明确建言者。从这个角度说，袁之奏请既顺应了朝野立宪诉求，自己亦可借此

博取宪政改革鼓吹者的地位和名声。

二、参与考察团筹备工作及主持调查吴樾案

1. 袁世凯与考政大臣的选定及组合

据军机大臣荣庆记载,至1905年7月9日考政大臣有了初步人选,其本人与选^{[18]85}。惜其记载过简,揆诸报刊舆论我们可以对选拔过程有较为详尽的了解。

清廷最初动议考政大臣由贝子载振、军机大臣荣庆、户部尚书张百熙、湖南巡抚端方组成。荣庆不愿前往,改派军机大臣、外务尚书瞿鸿禨,瞿以路远为辞,又改派徐世昌^[19]。户部尚书张百熙以“户部整顿需人”为辞,保荐右侍郎戴鸿慈^[20]。载振“以权位太重,恐外人疑我借此干预和局”,故改派权位稍次的载泽^[21]。由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定为初选考政大臣。然据考察团随员李焜瀛之子李宗侗记载,考政大臣的选出实为政府内争的结果,奕劻、袁世凯起了关键作用:奕劻在军机中专政,素与瞿鸿禨不合,“欲去之而后快”,乃商与袁世凯、徐世昌,袁、徐商妥为预备立宪,须先派大员考察各国宪政,外部尚书瞿鸿禨必与选,以此排挤他出军机。然瞿以年老辞,徐世昌在军机中最年轻,不得不自告奋勇请行^{[22]37}。不少枢机重臣对于出洋考察缺乏热情,某些人甚至将选拔大臣出洋当做排斥异己的手段。可见,自选拔考政大臣起政府内争即已显现,中枢机构并未形成强有力的宪政改革领导核心。

考政大臣选定后,接下来就是如何组合。据《绍英日记》记载,1905年8月4日初步拟定载、戴、绍为一路,徐、端为一路^{[23]589}。据戴鸿慈、端方考察团随员陈毅称,在五大臣出洋考察谕旨颁布之前,“袁世凯与端方尚无深交”^{[24]366}。然而随着遣使决策的建立,端方开始了与袁世凯的交往。据《新闻报》报道,端方曾于8月8日密赴天津晤商袁世凯,“未言定到津日期,忽于(七月)初八日午后,仅带随从二人,并未知会铁路局员预备专车”^[25]。此次晤商,最终确定了考察大臣的分途问题。两天后,戴鸿慈在日记中写道,这天最终确立以载泽、徐世昌、绍英为一路,戴鸿慈、端方为一路。8月14日协办大学士那桐赴津,8月16日那桐、端方、张百熙、铁良又同赴天津,与袁世凯进一步协商出洋事宜^[26]。

2. 袁世凯与考察团随员的选拔

考政大臣负责选拔各自的随员,亦有他人保荐者。袁世凯推荐了精通英、法、日三国文字的长子袁克定^[20]。但是,对于某些人才袁世凯则不肯放手。早在选拔随员之始,端方即欲将谙习俄文的桂芳选入考察团,因该员参与议定东省条约不果。考察团将要赴俄国之际再次奏调桂芳,袁仍以该员“随议俄约”为辞^{[27]314}。

实际上,不少省份对此次出洋考察密切关注。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在致外务部电中表达了派员随同考察的愿望:“星使所询考之事外国必肯指引详告,较之寻常游历益处甚多。”^{[10]9366}各省共有12人随同考察:湖北4人,奉天、广东、江西、湖南各2人。舆论对江苏未委派随同考察人员颇感意外:“两湖两广皆派随员同往,惟两江尚付阙如。”^[28]直隶亦无随同考察人员,此论比之直隶亦可。但我们不能因此判定袁世凯消极对待此次出洋,实际上袁对出国考察极为看重。与遣使谕旨颁布仅隔四天,1905年7月20日,袁世凯奏请新选官员到任前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司法各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29]1162},此奏实有呼应出洋考察之意。

3. 袁世凯与考察经费的筹措

户部最初议筹考察经费五十万两,但此数招致舆论政府“甚啬”的指责,袁世凯建议八十万两,遂确定为考察经费数额^[20]。外务部、户部1905年7月23日致电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及湖广总督张之洞,“望先迅筹巨款,以资提倡”^{[10]9352}。三总督商议各认解十万两,在他们的表率下大部分省份认解积极,舆论即称“大约八十万之数可以如愿以偿”^[30]。该项经费从1905年下半年算起,按年认解。张之洞在10月份将1905年下半年应解经费五万两汇交沪道^{[10]9364}。直隶财政虽然“万分窘迫”,但考虑到此项经费“关系大局”,“不得不设法罗掘”,因此,在1906年1月9日将认解十万两汇解^{[31]2150}。可以

说,两省较好地发挥了示范作用。

4. 袁世凯与吴樾炸弹案的调查

1905年9月24日,考察团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行时遭到吴樾炸弹袭击。次日,清政府颁布上谕,采取严办方针,责成相关部门“彻底根究,从重惩办”^{[32][31]}。在天津开创警察制度的袁世凯主持了案件调查,案发当晚即派津海关道梁敦彦、天津巡警总办赵秉钧带领密探、医生等人往京查办。9月26日公布调查结果,确定炸弹案为革命党所为,车内死尸为凶手,“系临时混入行凶”^{[31][202]}。10月3日在北京抓获四名革命党,供出吴樾姓名。确定吴樾身份后,随即调查曾与吴同住的顺天候补县汪炘,由徐世昌亲自密审,“拟擢用之,以安反侧”^[33]。鉴于吴樾就读保定高等学堂时貌似安分,学堂未能觉察其情可原,监督王景禧仅记大过^[34]。案件调查同时,清政府于10月8日设立巡警部,徐世昌任尚书、赵秉钧任侍郎,袁世凯在直隶创办的警察制度最终移植到北京。更重要的是,徐为袁之盟友,赵为袁之属吏,随同戴鸿慈、端方考察团出洋的陆宗輿即言巡警部之设为袁世凯“预闻内政之始”^[35]。

综上,诸如随员选拔、经费筹措等考察团筹备事宜,袁世凯始终参与其中,大致能助力其事,展示出他对宪政改革的认同态度。主持调查炸弹案,亦能根据客观形势采取“宽办”策略,顺应了当时舆论界吁请政府将注意力转向宪政改革,不要被革命党所阻的一致要求。另外,考政大臣如何分途袁世凯甚至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考察团出行之前京中大佬纷纷至津与袁晤谈,袁在直隶开创的警察制度被移植到北京,无不凸显出袁世凯在晚清政局中的重要地位。

三、考政大臣两次立宪期限调查中的态度

吴樾炸弹案发生后,《申报》刊登《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一文,指出炸弹案的发生无异于警示清政府宪政改革万不能缓:“今日爆裂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有大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慑于彼党之一击而踌躇,不定其政策,日后危险之爆发将有百倍于此者。”^[36]其意非常明显,在于为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加油鼓劲,不能因为一时受挫而逡巡不前,而应当激流勇进。与之一致,案发后“内外人士多有以速发布立宪明诏以安人心为言者”^[37]。

前文述及,清政府推行宪政改革的决策模式属于“渐进政策决策模式”,然而在吴樾炸弹案后,身历其险的考政大臣一反此前对宪政改革缄默之态,一个重大的回应举措即是会衔奏请两宫明降谕旨,宣布立宪改革。考察政治大臣很清楚,吴樾案后明确建言宪政期限虽有良好舆论氛围,但还是需要得到在政局中炙手可热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支持。因此,在端方主导下,“与袁慰帅商妥拟请先降谕旨”,就宪政改革抛出一个明确的提案,“以十五年为期实行宪政”,并征询督抚意见。国内媒体诸如《南方报》、《时报》、《大公报》对督抚的回复给予密切关注:“周玉帅、赵留守先后覆电附和;岑云帅并嫌十五年期限太久,拟更改速,惟于调查一节则不甚谓然;而张香帅电覆独谓,此时降旨立宪未免过早,……慰帅颇讥香帅此论为模棱。”^①

袁世凯讥讽张之洞为“模棱”之论,然据当时报刊透露,袁世凯的复电亦未置可否,仅答以“表示同情”^[38]。虽然提议以十五年为宪政期限袁世凯与谋在先,但袁世凯的复电显然又将自己隐藏在了事件的背后,此种行为无它,当是政治经验使然,袁世凯仍在等待明确表示自己宪政态度的最有利时机。虽然各省督抚、将军回应不一,考政大臣还是决定将这一主张上奏。与此同时,时论亦强烈要求立宪愈早愈好,“宪法早立一日则利权早一日保全”^[39]。受其影响,慈禧对宣布立宪期限亦“颇以为然”,然当“询诸各军机大臣,皆噤无一语”^[40]。慈禧遂谕令奕劻召开会议,“俟五大臣回国再行宣布定期”^[41]。

1906年6月份,两路考察团开始陆续返国。这一时期,朝野的立宪热情达于极点,时人即意识到考政大臣归国后必有大动作,所谓“治乱所关,中外仰望”^{[42][14]}。但反对派力量也很强大,“顽固诸臣百端阻

①参见《各省督抚对立宪之意见》,《南方报》1905年11月27日,第2页;《各大员对于立宪意见》,《时报》1905年11月27日,第6页;《立宪意见不同》,《大公报》1905年12月7日,第3版。

挠”，宪政改革派“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43]。然而在浓厚立宪舆论氛围包围下，反对立宪者则被视为“丧心病狂”^[44]。

1906年7月21日，戴鸿慈、端方回抵上海，他们委托张謇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再一次调查地方大吏对立宪期限的态度^①。8月1日，戴、端将该电致送各省督抚、将军：

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故诸政可因时制宜，惟宪法则一成不变，是以上下相维，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摇也。……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画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民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我公公忠体国，虑远谋深，必能观古今中外之通，为宗社人民之计，祈指示。^[45]

此时的袁世凯斟酌局势，摇身一变为宪政改革积极助推者的角色。袁世凯回电予以支持：“公等政见，深表同情，应速宣布，以慰民望。”^[46]两广总督岑春煊亦明确表示支持，回电“十年为期甚乐赞成”，其余多数大员则未明确表态。两江总督周馥答以“应办之事甚多，……须量力渐进”^[47]。盛京将军赵尔巽“建议考察团与直督袁世凯商定”^[48]。稍后，赵尔巽又明确指出当以15年立宪期限：“变政以先明秩序为最要，预备以地方自治为根本，现在国民程度相去太远，宜以十五年为限制。”^[49]湖广总督张之洞回电称“立宪一事关系重大，……此时实不敢妄参末议”^{[10]9509}。反对者亦有。云贵总督丁振铎反对颁布立宪期限：“各国之政治概无我国可以仿行者，盖各国现行之政治决非当日改政变法时之政治也，……举行宪政不在乎取法外国之政治，而贵于养成国民之公心。”^[49]绥远将军贻嵩则明确反对立宪^[49]。

综上，虽然各地方大吏对立宪期限多以“不明确”为答，但除贻嵩全然反对立宪外，倾向立宪的地方大吏占据了绝大多数，袁世凯亦明确表示认同立宪以及预先颁示立宪期限，这无疑是在五大臣出洋期间国内政局的新动向。然而，学界常援引两则史料，说明这一时期的袁世凯阻挠宪政改革：其一，汪大燮1906年4月致函汪康年透露，载泽称改革阻力有二：“小阻盛宣怀，大阻袁世凯。”^{[14]837}其二，袁世凯幕僚张一麀记载，五大臣归国之初国内“舆论靡不希望立宪”，张謇趁此时机再次致函袁世凯，“以大久保相期，而自居小室信夫”，然而袁世凯以“人民教育未能普及，程度幼稚”为由，恐立宪之后权在人民，画虎不成反生“种种流弊”^{[13]470-471}。对这两条史料的解读，必须要考虑当时的情景。就前条史料而言，载泽之言主要是对袁长时期不敢明言宪政的不满；就后条史料而言，国人智识提升无疑是推行宪政改革的必要前提，袁世凯的认识并无差错。况且袁世凯只是表示了担忧，并不能理解为反对宪政。

前文述及，遣使出洋谕旨颁布后，袁世凯与端方才开始了深入交往。而在戴鸿慈、端方归国后，袁世凯更是与之结成政治联盟，共同成为宪政改革派的代表人物。戴、端考察团抵达天津时，袁世凯还参与了《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的最终拟定。1906年8月3日，戴、端由吴淞口北上时已拟定该折初稿，8月6日至天津。由于官制改革决定官制格局走向，直接关乎政府官员的切身利益，当戴、端抵津时，袁世凯又将自己关于官制改革的思路加入到该折中，考察团因此在津滞留四天之久。张一麀记载，戴、端抵津后，袁嘱其“将预备立宪各款作说贴以进”^{[13]471}。除张一麀的记载外，亦有其他记载可以佐证^②。显然，端、戴回国之前，袁世凯已经准备好了官制改革的方案供其参考，其参与官制改革之心昭然若揭，无怪乎宪政改革反对派胡思敬在致瞿鸿禨函中发出“五大臣归国，北洋之志不小”的慨叹^{[50]495}。

^①章开沅指出该电由张謇起草，但并未注明资料来源。见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本文暂从其说。

^②御史赵炳麟称，端、戴与袁世凯会晤时，袁主张先组织责任内阁，“俟政权统归内阁，再酌量开国会”，并令幕宾张一麀、金邦平为疏，“使端方回京上之”，参见赵炳麟：《赵柏严集·光绪大事汇鉴》，（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613页。反对立宪改革的胡思敬对此一情节的描述尤为形象：“五大臣归至天津，世凯劳以酒，曰：‘此行劳苦，将何以报命？’皆愕然，莫会其意。世凯出疏稿示之，曰：‘我筹之久矣，此宜可用。’遂上之。”参见胡思敬：《退庐全集·大盗窃国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1354页。此外，报刊舆论《新民丛报》、《新闻报》对此亦有报道。参见《中国大事月表·丙午六月》，《新民丛报》第84号，第88页；《立宪先从天津实行》（录《新闻报》），《华字汇报》1906年8月26日。

四、官制改革中力言宪政及开缺回籍

两路考政大臣归国后皆建言师法日本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如载泽在《吁请立宪折》中即言日本之宪政体制“公论虽归之万姓,而大政仍出自亲裁”,“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施诸中国尤属相宜”^{[51]1-2}。在改革步骤上他们亦提出效仿日本,将官制改革作为入手办法,核心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他们的陈奏和国内高涨的立宪氛围相互配合,促使慈禧的立宪态度发生根本转换,“谕以只要办妥,深宫初无成见”^{[43]2}。

上述政治发展态势对袁世凯亦是极大推动。袁世凯很清楚,此时为决定推行宪政改革与否的关键时期,在此一紧要关头如果还像以往对宪政改革有所保留的话,不仅会被舆论扣上反对立宪的帽子,宪政改革亦有可能真的中断,因此袁世凯不再过多强调影响中国宪政改革的诸多主客观因素,转而在宪政改革中充当了先锋角色。1906年8月25日,清廷派醇王载沣、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以及袁世凯阅看考政大臣奏陈折件。宪政反对派铁良声言各国立宪皆由国民要求,如果未经国民要求而授之将适得其反。袁世凯反驳道,中外情势有异,“各国之立宪因民之有知识而使民有权,我国则使民以有权之故”^{[43]4},甚至有“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之言^{[52]29}。随后,清廷9月1日颁布“仿行宪政”上谕,将宪政改革确立为基本国策。这个局面的得来无疑是清末宪政改革一大进展,也是立宪赞成派奕劻、袁世凯、载沣、端方的政治胜利,《东方杂志》临时增刊《宪政初纲》即称:“宣布立宪当以泽公等为首功,而庆王、袁制军实左右之。”^{[43]5}是论恰恰说明了以载泽为首的考政大臣和袁世凯等人互为奥援的事实,也正因为此,时论将改立宪政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袁世凯、端方等人,本文开篇所引《华字汇报》即是明证。

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袁世凯力主设置责任内阁以达到虚君摄政的目的。学界普遍指出,袁世凯在戊戌时期得罪光绪皇帝,他担心光绪亲政于己不利,由此利用责任内阁限制君权,“定义总理一人,属现在之领袖”,即庆亲王奕劻,自己为协理^{[52]30}。奕劻与袁世凯深相结纳,“一听命于北洋而已”^{[52]26}。然而袁世凯力主责任内阁制不能仅仅视为出于权势考虑,“虚君”之义显然正是宪政精神的要求及体现。实际上,不仅仅袁世凯唯恐光绪掌权于己不利,清廷对于手握重兵的袁世凯亦是颇有顾忌,甚至心存畏葸,试图借推行宪政达到使清帝与袁世凯弭衅于无形、巩固皇室权威、缓和革命潮流等多个方面的目的。戴、端考察团随从人员陈毅即言:

清廷的勋阔懿亲则尚另有顾虑,认为袁世凯既因陷害清帝而被西太后宠任,得以久据北洋,重兵在握;然而西太后一朝身死,则世凯为自卫计必将以非常举动夺取全国政权,于是清祚的危机可能以另一种形式爆发,而彼等恃以为缓急者仅有两湖总督张之洞一人。之洞固亦以握有新军为彼时国内所瞩目者也,无何而举行河间秋操矣,清廷令袁、张二人所握之兵,各任两个假想交锋团体之一,乃成绩所示,强弱判然,之洞既嗒然若丧,而所谓勋阔懿亲者尤感幻灭,不胜其祸至无日之恐。……西太后为缓和革命潮流计,为使清帝及袁世凯间得弭衅于无形计,为爱新觉罗万世尊荣计,不能无所动于中,而世凯尤欲仗此以谋自全之策。^{[24]365-366}

这一记载至为重要,为我们全面审视清廷与袁世凯的关系提供了依据。显见,双方皆试图利用推行宪政改革达到利益最大化,但由于目的各异,在是否采行责任内阁制问题上双方针锋相对。清廷自然明白,如果袁出任内阁副总理,则更成尾大不掉之势,因此清廷皇室强烈抵制袁世凯设置责任内阁之议,袁世凯致其兄袁世勋函中曾言及载沣因意见不合甚至手枪相对^①。最终,官制改革方案并未采纳责任内阁制,袁世凯在政治上亦处于失势状态,清廷借此时机迫使袁在1906年11月18日连上《恳恩开去各项兼差折》、《陆军各镇请分别归部留直统辖督练片》,自请开去八项兼差,并将北洋六镇中的第一、三、五、六镇划归陆军部统辖,仅留第二、四镇由己调遣训练。

丁未政潮临近结束之际,奕劻、袁世凯势力再度膨胀,虽有前次“兼差尽行撤去”的教训,但此时的

^①参见张国淦的《北洋军阀的起源》,载于杜春和等编著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袁世凯似乎遇挫愈力,1907年7月25日再一次奏请设立责任内阁:“今日改官制而去内阁制度,舍其本而未是图,主脑既差,精神胥失。”^①7月28日,袁世凯又奏请遣派专使进一步详细考察德国、日本的君主立宪体制,原因在于“载泽等奉使出洋原为考求一切政治,本非专意宪法,且往返仅八阅月,当无暇洞见源流”^{[17]202}。可以说,袁世凯上述举动既是对立宪反对派的回应,又是袁世凯此时遇挫又复转机之愉悦心境下对待宪政的真实心态。清廷从其议,9月9日派遣汪大燮、于式枚、达寿考察英、德、日三个君主立宪制国家,时人即言:“日、英、德为君主之国,朝廷遣派大员,前往考察,用意极为深远。”^[51]

清廷在接受袁世凯奏言的同时,也对其采取了防范措施。1907年9月4日,清政府调袁世凯入军机处,同时亦调张之洞入军机处。袁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实为明升暗降,袁、张同入军机亦有使二人互相牵制之意。此时袁世凯愈加认识到宪政改革之难,1908年初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言:“(改革)牵涉到要彻底改变甚至推翻现存体制的某些方面。而这个体制已经存在了许多个世纪,诸多因素盘根错节地紧紧交织在一起。”但是直到此时,他对于宪政改革还是充满信心的:“就民意支持的情况而言,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给我们时间再加上机遇,我们无论如何都能够实现改革的大部分目标。”^{[54]142}然而,政局急遽演化或许是袁世凯没有预料到的,他所谓的“机遇”再不可能实现了。1908年底光绪、慈禧相继去世,载沣上台后大搞中央集权,1909年1月2日以“足疾”令袁世凯“回籍养病”。袁解职后虽能依仗“后台老板”奕劻暗中观察朝政,但袁世凯对宪政改革基本不予关注亦无能为力关注了,同时袁之解职对于载泽、端方等改革派亦是极大的冲击,“自项城去后,泽公恐招物议,尝谓此后朝中大政概不与闻”^{[55]214}。1910年2月,另一位宪政改革派端方亦被革职,宪政改革派的中坚力量再次遭到重创,清末谋求政体改革的希望愈来愈化为泡影。

五、结语

袁世凯是一个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争议无疑体现了其重要性、复杂性。通过对日俄战争以至官制改革袁世凯的相关表现可以看出,袁世凯对宪政改革基本上是助力为主,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正如马勇先生所言:“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56]然而我们在肯定这一论断的同时,尤其不能忽略袁世凯宪政改革态度的转变过程。具体而言:考政大臣回国之前,主要考虑宪政改革之难,表现出一定的“保守”;考政大臣归国至官制改革,基于国家发展及个人权势考虑,充当了宪政改革主将,表现出相当的“激进”;1907年9月入军机至1909年初革职,在经历严酷政治斗争后对宪政改革的困难又有了新的认识。此一过程中,袁世凯作为既得利益者,既有向宪政国家趋近以政治革新实现国家富强的追求,又有借宪政改革在政治漩涡中维护权势的意图。

就前一点而言,袁世凯权高位重,政治嗅觉灵敏,“在李鸿章死后留下的政治真空中,他看到了自己将成为清国政治舞台上第一角色的机遇”。尤其是当面对日俄战后国家之困境以及宪政思潮的日益勃发时,袁世凯“认识到国内外舆论会造成的各种政治机遇”,“他在审慎地估量着这股新生力量的强弱和走向,并给自己设想了一个可能发挥领袖作用的合适位子”^{[54]137-138}。因此,在宪政思潮日盛一日的情势下,袁世凯能够建言遣使出洋,使这种此前被立宪派提出的主张成为现实,在考察团归国后袁世凯更是成为宪政改革派主将,与考政大臣互为奥援,显然袁世凯对于国家发展毕竟能够作出顺应时势的应对,这与那些冥顽不化的官员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掺杂了谋求“清国政治舞台上第一角色”的政治目的,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时论对袁世凯寄予厚望。

就后一点而言,袁世凯作为既得利益者,亦有其历史局限。推行宪政改革说到底还是权力再分配,对于国家、民族来说是富强希望之所系,对于既得利益群体而言则意味着巨大冲击。托克维尔在《旧制度

^①参见《直隶总督袁世凯折》、《直隶总督袁世凯密陈管见十条清单》,转引自侯宜杰《袁世凯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与大革命》中指出：“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57][210]} 改革过程中，如果社会矛盾冲突得不到有效控制，极易导致政治危机，乃至使国家陷于瘫痪，因此，“一个整合的强有力的近代化精英群体是避免近代化进程中国家陷入政治危机的关键因素”^[58]。然而，清末宪政改革正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近代化精英群体，宪政改革发生异化，权力角逐再次上演，袁世凯身处其中亦难幸免。由于袁世凯在清末政局有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在政治斗争中追逐一己权势的趋向虽为官场规则不必过多非议，事实上却被研究者扩大化了。同样，那种忽视袁世凯借宪政改革中维护一己私利，认定袁世凯是清末宪政改革最大功臣的说法亦欠妥当。

综上，清末时期袁世凯对待立宪政治在“激进”与“保守”之间徘徊游弋，看似矛盾的表现却更加真实地反映了袁世凯对待宪政改革的态度，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清末变革时期政府高层官员的政治活动实态以及官场生存法则。

参考文献：

- [1]宣布立宪之事宜[N]. 华字汇报, 1906-09-03(3).
- [2]王彦威. 清季外交史料[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
- [3]故宫博物院.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 卷 83[M]. 北京: 故宫博物院, 1932.
- [4]出使法国大臣孙上政务处书[J]. 东方杂志, 1904(7).
- [5]朱寿朋. 光绪朝东华录: 第 5 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6]伊 杰. 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动因及其演变过程[J]. 近代史研究, 1989(3): 103-106.
- [7]论袁官保密陈管见十条[N]. 盛京时报, 1907-9-26(2).
- [8]记五大臣奉使出洋原起[N]. 南方报, 1905-10-21(1).
- [9]京师政界近信[N]. 时报, 1905-09-19(3).
- [10]苑书义. 张之洞全集: 第 11 册[M].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
- [11]张 謇. 啬翁自订年谱[M]. 北京: 中华书局, 1930.
- [12]南通市图书馆, 张謇研究中心. 张謇全集: 第 1 卷[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
- [13]张一麐. 心太平室集[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4.
- [14]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 第 1 册[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5]陈旭麓. 宋教仁集: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16]梁素珍. 政治学原理[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3.
- [1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 上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18]谢兴尧. 荣庆日记[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6.
- [19]徐军机钦使出洋之故[N]. 时报, 1905-08-06(6).
- [20]特派出洋大臣始末[N]. 时报, 1905-08-04(6).
- [21]再志钦派大臣赴各国考求政治事[N]. 时报, 1905-07-30(6).
- [22]李宗侗. 五大臣出洋与北京第一颗炸弹[G]//传记文学: 第 4 卷第 4 期. 台北: 传记文学杂志社, 1964.
- [23]绍 英. 绍英日记[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 [24]陈尧甫. 随戴鸿慈、端方出国考察政治纪略[M]//沈祖炜. 辛亥革命亲历记.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
- [25]端午帅赴津洋志[N]. 新闻报, 1905-08-17(2).
- [26]电报一[N]. 时报, 1905-08-18(3).
- [27]罗香林. 梁诚的出使美国[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74.
- [28]江督派员随同五大臣出洋[N]. 时报, 1905-12-17(6).
- [29]廖一中. 袁世凯奏议: 下册[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3.
- [30]各省认筹亲贵大臣出洋经费记数[N]. 时报, 1905-08-14(6).
- [31]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文献编辑委员会. 袁世凯奏折专辑[M]. 台北: 广文书局, 1970.
- [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 第 31 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 [33]电报一[N].时报,1905-11-14(3).
- [34]车站炸弹案之株累[N].申报,1906-02-27(3).
- [35]陆宗舆.五十自述记[O].北京:文楷斋本.
- [36]论五大臣遇险之关系[N].申报,1905-09-28(3).
- [37]盛宣怀力阻立宪[N].时报,1905-11-02(6).
- [38]电报一[N].时报,1905-11-04(3).
- [39]立宪意见不同[N].大公报,1905-12-07(3).
- [40]预备立宪尚未交议[N].新闻报,1905-11-12(1).
- [41]两宫注意立宪近闻[N].南方报,1905-11-22(1).
- [42]瞿鸿禨朋僚书牍选:上[G]//近代史资料:第108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 [43]考政大臣之陈奏及廷臣会议立宪情形[O]//宪政初纲,1906.
- [44]论今日舆论之两大派[N].华字汇报,1906-09-05(2).
- [45]端戴二大臣致各省总督商议立宪电[N].时报,1906-08-13(6).
- [46]各省疆吏对于立宪之政见[N].时报,1906-11-30(6).
- [47]江督周覆端戴两钦使商榷要政电[N].时报,1906-08-02(6).
- [48]赵次帅覆端戴两大臣商议立宪电[N].时报,1906-08-11(6).
- [49]补录各疆吏对于立宪之政见[N].时报,1906-09-26(6).
- [50]胡思敬.退庐全集[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
- [51]载 泽.吁请立宪折[O]//杨寿楠.云在山房类稿:第1册.铅印本.
- [52]陈旭麓.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 [53]内阁会议政务处酌定日英德宪政大臣考察宪政要目[N].申报,1907-12-05(3).
- [54]郑曦原.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55]端方密函[G]//近代史资料:第43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 [56]马 勇.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J].安徽史学,2012(3):13.
- [57]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58]贺跃夫.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J].中山大学学报,1993(3):82.

Yuan Shikai and the Five Commissioners Deleg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Reresearch on Yuan' Attitude on Constitutional Reform

Pan Chong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Yuan Shika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especially had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 The decision that Qing government dispatched a five ministers delegation after the Russo-Japanese War was advised by Yuan. In addition, the fund raising, staff selection, the Wu Yue bomb case, Yuan was all involved and played a role of promotion. But on the delegation' investigation about the constitutional attitude Yuan was not to say yes or no but replied with obscure words. Until the delegation return Shanghai, Yuan began to support constitutional reform explicitly and strongly advoca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responsibility cabinet. As a vested interest, Yuan had the desire of constitutionalism, and also had the intention to keep his political power.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performance but more truly reflected the attitude of Yuan' constitutional reform attitude, its also from one side highlighted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rule of surviva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Yuan Shikai; Duan Fang; constitutional reform; five commissioners delegation

(责任编辑 张春生)